

NUMBER



NATIONAL MEMORIES II

TAKEN BY:

LOCATION:

SUBJECT:

国家记忆

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RELEASED FOR PUBLICATION:

主编

章东磐

晏欢

戈叔亚

DATE:

RELEASED

ISSUED TO:

IF PUBLISHED CREDIT
SHOULD BE GIVEN AS FOLLOWS
"OFFICIAL PHOTOGRAPH
U. S. NAVY"

Return to: Photographic Library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K065.06
13
12

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主编 章东磐 晏欢 戈叔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2 / 章东磐, 晏欢, 戈叔亚主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03-07640-7

I. ①国… II. ①章…②晏…③戈…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②抗日战争—史料—印度 ③抗日战争—史料—缅甸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5073 号

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2

主 编：章东磐 晏 欢 戈叔亚

翻 译：晏 欢 戈叔亚 安 康

责任编辑：贾 娟

特约编辑：谷文彩

装帧设计：老陆工作室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8

字 数：10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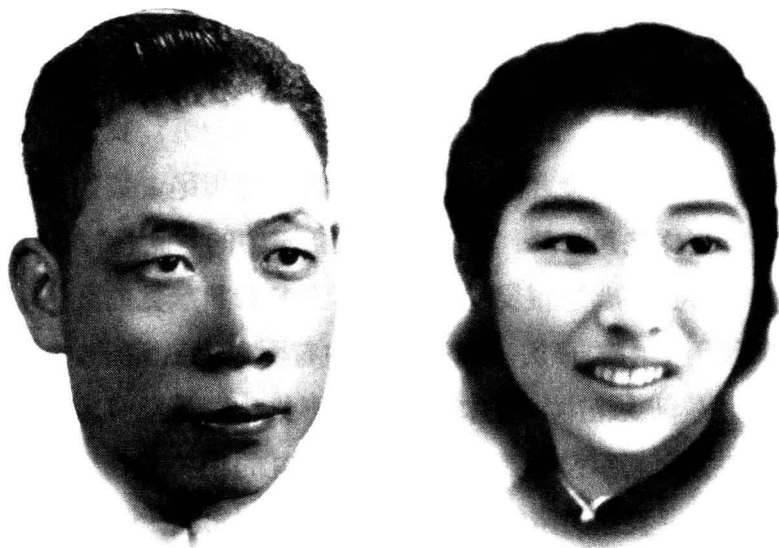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7640-7

定 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父亲 我想给您说句话

杨延康

2003年的冬日，气候感觉比往年冷。我到了甘南夏河拉卜楞寺院，准备拍摄另一个新的纪实摄影专题《藏传佛教》时，接到从贵州老家来的消息，父亲去世了。我把行李存放在僧人老师的僧舍，去兰州赶飞机，为父亲奔丧。

父亲杨景涛，1918年出生在山东淄博张店区的农村，18岁时离开家乡，南下投军，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时，他在第五军某汽车连任文书。他走过“野人山”，去过印度。后来在云南沾益后方医院养伤时，认识了我的母亲，那时她在军队医院做护士。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起过那段模糊的岁月，今天的回忆全在他偶尔流露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来。父亲固执古怪，对我们非常严厉。我们五个孩子都挨过父亲的拳头，父亲告诉我们，要做正直的人。我们姐弟几人上学，当兵，参加工作，都因为父亲“旧军官”的身份而遭拒绝，我们只能进合作工厂去工作。我曾有过当文艺兵的梦，想演《白毛女》中的“大春”，但政审却没过关。为此，我同父亲吵过嘴，怨恨父亲为什么不去参加共产党的队伍。那时的我哪里知道，中国那段历史中的真实。记得我家中有两只大铁箱子，在我的记忆里常常是锁着的。其中一只铁箱中，有本钢皮的老影集，那是父亲的记忆。我曾偷看过，父亲年轻英俊，穿着军装英武的照片，用讲究的相角夹存着，看着他，我有几分喜悦和几分胆怯。我把父亲的记忆装在了心里，挥之不去。

“文革”中，铁箱里影集中的照片在一个夜晚化成了灰烬。

飞机降落在贵阳。关上记忆的门，我匆忙去赶客车回到安顺家中，父亲已安卧在简易的灵堂里。轻轻掀开父亲身上的那床薄被，我把脸贴在父亲冰凉的面颊上，任热泪滑落……

父亲享年 86 岁。

这个曾经给我精血骨气的父亲走了，带着荣辱遗憾永远地走了！我心中曾想对父亲说的那句话还没有说出，父亲却走了。

这个冬日，实在寒冷。短短的一周里，父亲走了，我的导师侯登科走了，摄影兄长王毅也走了……

这难道是我开始拍摄藏地十年所要付出的代价？难道是亲人、兄长们去天国护佑我即将漫长远行的岁月？我懂得深深的感恩和珍惜，感恩父亲给了我生命，使我在生命成长的历程中有了善良和真诚，珍惜岁月里导师兄长给我的教诲和信念，使我有对摄影的热爱和追求。

我又回到了甘南夏河拉卜楞寺院，把悲痛装进行囊，静下心来，开始了我对藏地信仰中日常生活所理解的拍摄，苦行僧般去背负当代影像中的那份责任，如同当年的父亲，毅然上路。

2004 年 8 月，我从藏地来到了云南，同孙敏、东磐兄去寻找采访当年的中国远征军。这是一条父亲曾走过的路，我行走在父亲的战场上，仿佛看见前面的队伍中父亲的背影。我们去了松山战场、腾冲，翻越高黎贡山，在抗日战斗中牺牲中的士兵墓前肃穆流泪。我们叩开一扇扇当年远征军老人的家门，听他们讲起滇

西抗战浴血的经历，抚摸他们身上当年留下的弹疤和后半生的苦痛。我们向活着的和死去的将士致敬，但却不敢对视父亲般年老浑浊的目光，那目光中依然有年轻时的英武之光和现实中的悲辱之光，那生命中残留的光芒，永不磨灭。我只用照片记录父亲们的诉说。可惜！父亲走了，如果他在，一定会为我们的寻访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在寻找一段真实的历史。

2010年，我的朋友东磐、牛子、晏欢等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带回了当年美国照相部队拍摄的中缅印战场的影像。这几万张伟大的影像找回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当我手捧着《国家记忆》这本书时，便开始在书中寻找当年父亲年轻时的身影。我在照片中仔细找，仔细找，也没找到父亲，我有些失望。其实，照片中每位年轻的将士身影，不就是我的父亲吗？对那张血气方刚的脸，我感到那么熟悉和亲切，那么敬重，我又一次听到了父亲强劲有力的心跳。在历史的长河里，父亲们是几粒不起眼的沙子，但这几粒沙子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多么重要，因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是你们用沙粒般的身躯筑建了一道防洪大坝，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没有灭亡。

感谢美国照相部队，感谢美国国家档案馆留下中国的那段历史，那些不灭的影像；留下了《国家记忆》，使我们识得路，回得家，使我们恢复了钢铁般的真实。

然而，今天的我也同当年的美国照相兵一样，在记录着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产生了无数应该去记住的影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国家记忆》中的一位见证记录者，因为我是一个中国军人的后代，用影像记录中国当今发展变化中的时代，我也是一名照相兵。

父亲，安息！我亲爱的抗战将士先驱们，安息！今天我把心中的那句话说出来，当做是献给你们，献给《国家记忆》的献辞：父亲！您在天之灵，一定能听到，当年的您没有错！您在这个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不论你们今天活着还是死去，都是无愧的！儿子将永远记住你们！

2011年8月25日

于成都菩提舍



早安！欢迎朋友！

我的名字叫悉尼·格林伯格。

六十五年前，我作为一名美军通信兵团第一六四照相连的战地摄影技术军士被派往中国，我执行了许多摄影任务，并且足迹踏遍你们的国家。

学说中国话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过程，使用筷子极为有趣，没过多久我就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了，一条全新的、迷人的大道在我脚下延伸开来。

你们把我当做朋友对待，我度过了两年从事摄影工作的美好时光，你可以在这个伟大的展览（“国家记忆”影像展）中看见我当年完成的工作。短暂的两年里，我为自己在这样一个友好的国家能够拥有如此美好的记忆而感到欣喜，我发自内心地想对大家说一声：谢谢！

再见！朋友们。

我为什么像狗一样咬住你们不放

章东磐

为《国家记忆》的第二卷序言写下这样一个标题的时候，我自己也笑了。因为严格地讲，大多数的狗都不会咬住对手不放的，除非那种叫比特的很丑的狗，那是血腥的人们非法赌钱而专门定向培育的，据说源自英国，但因过于血腥，现在欧洲已经禁养了。在广西农村近年反而有人养，记得我与朋友几年前从广东开车去云南，曾在贵港市附近清晨的田埂上看过这种恐怖的同类厮杀场面，只一分钟就明白了曾经嗜血的欧洲征服者后代们为啥不忍目睹这种能听见骨头咬碎声的以命相搏。这么剑拔弩张的标题大约是个镜子，我难道真是那么丑、那么凶巴巴的狗吗？

自《国家记忆》第一卷编选完成起，我就在思索一个问题：自己所做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这件事想了一年都没有弄明白，结果吴思先生新著《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当头棒喝，令我猛醒。与现今的所有产品诞生一样，历史学研究也是一条生产线，吴思先生处在生产线的最高端，因为他透过对历史的解读，糅进自己创造性的独立见解，进而重新解释历史，为今天的人树起可以清晰照鉴的镜子。我没有这样的学问根基，但不吝惜出力气，所以在这条生产线上负责原材料的收集与准备。没有我们这类吃苦耐劳的历史农民工，吴思先生们就要自己来挑拣材料，犹如让顶尖大厨亲自从剥洋葱皮开始，呛到泪流满面，端着炒勺擦眼睛，显然是不合理的浪费智力人才。

明白了这个使命，加之在我的另一项行业里得出的铁定结论：一切好产品最后都是拼原材料，对于基础材料的拣选与甄别自己就格外在意。在产品制造中，

原材料供应商是一定要靠得住的，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一时蒙得过去，时间稍长总是会出问题。现在，我们这个小团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场的历史研究中有幸成为了原材料供应者，我们自己求精求真的苛刻心态自不待言。

2010年2月，牛子率领复制班子抵达华盛顿，全体人马会合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第一个上午，我们确定了两个原则：1.所有美国照相兵拍摄的CBI战场照片要不加挑选地复制；2.照片正面和背面均以扫描仪的最高精度复制。当时对于牛子提出的第二点，我曾提出异议，询问他为了扫描画幅并不大而且不是底片的照片，这样精度的扫描是否值得。如果当时稍微放宽一些扫描精度，无论是扫描需要的时间还是存储设备都可以减少大约一半，那是钱呀。牛子坚持了他的意见，我们达成了共识，他在整整六十天的繁琐工作里对此事始终咬住没松口，我们队伍里的三位“80后”平生第一次遇见这么较真的领队，依着他的标准把活干完了。

在他们完成复制工作整整一年后，我们开始筹备在国内的第一场大型展览，设计师赵妍在展厅的中央悬挂了40幅将近5米高的抗战人物肖像，全部是剪切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照片的局部。第一眼看见这些顶天立地的军人们，我被“雷”到了。如同在美国初见一样，真切的细节幻化成了视觉巨浪，排山倒海，扑面而来。那位在美国让我热泪盈眶的中国草鞋兵，脚上编鞋的麻绳放大到手指头那么粗，竟然还看得出其中的纹理。真实是需要细节的，真实的细节放到再大都挑不出破绽来。

美国照相兵再一次感动了我。上一次是因为他们为我的祖国留下了海量抗敌父辈英勇的身影，这一次是他们的工艺和工作态度。想一想他们拍摄这些画面的环境，有时近到一张照片上能同时看到近距离互相对射的敌我双方，那是在没有望远镜头的年代呵。卡帕那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还不够近。每一位照相兵都够近了，近到除了并不小巧的照相机外，他们还要随身带着士兵的卡宾枪；近到他们直接俘获过日本士兵；近到为了拍摄更清晰的轰炸效果，载着照相兵掠地飞行的飞机气流引爆了地雷，地雷把飞机炸到百孔千疮。关键还不在此，

而在这种环境里照相兵们交出来的“活儿”，从档案馆取回来的两万多幅，居然还没看到哪一幅“焦点不太准”。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我们得知，我们复制的这些照片都是在拍摄后很短时间洗印的，档案馆并没有保存底片。一开始我们很为扫描不到底片而担忧，担心这些完成于烽火战场上的照片因为任何一个工艺环节的不到位而丧失进一步放大画幅的基础。我们此前在国内看到的战场历史照片就几乎全数存在这个缺陷。这一次展览完全释开了疑虑。在照片洗印行业，“银盐”总被挂在高手的嘴上，其实我们少年时代用红布蒙住厕所的灯在洗脸盆里玩的就是这东西。但人家在战场上玩得一丝不苟，玩到可以把原始照片上苍蝇般的一只猴子放到狗那么大还看得清绒毛的反光，那是真正的银盐在起作用，让影像被分子级的微粒来记录。这样记录下的战场，为后来的历史资料找寻者留下了多少细节。正因为如此，这批从美国归来的照片就有了比数量更有价值的细节，无数的此前从未为我们窥见的细节。

清楚了自己在历史研究链条中的位置，就更深切地了解了犹如大厨助理般材料准备的岗位责任，自己要做的事基本与食客的赞誉无关，但如果本应清淡鲜香的鸡汤里漂出死苍蝇来，挨骂的肯定是负责挑拣与洗菜的小工。我们要做那个好小工。

随着历史禁锢之门的逐渐打开，对抗战正面战场尤其是滇西与缅甸战场的调查与写作渐成热点。大量托名于“口述史”、“纪实”与“回忆录”的书籍出版。然而，多则多矣，其中能达到“重新解释历史”水平的，恕我直言，一本也没有，这个评价也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而更要命的是，解释历史的使命无力完成，起码要把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地作好，可惜的是，这一批一批的书籍中，达到了这个基本水准的都少之又少。

在我自己对这段历史与战场所作的田野调查与资料收集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要进入历史的领域，至少先让自己想清楚了三件事，然后再决定插不插脚进这个行当，那就是：立场、方法与知识。这几件事其实是对所有调查及后续工作参与者的要求，包括讲述者、记录者、编辑者、出版者，甚至被邀来写撑场子前

言与站台推介的权威人物。我在历史调查与写作的事情上始终自认为是个“票友”，但我秉持追求客观、公正、真实的立场，不求轰动，看淡赞誉；以自己能力所及的分析与思辨方法来判断，发现疑点，当不放过；另外，把相关知识带进对这个领域的调查与分析，不尽信哪怕当事人甚至当事权威机构之所言，用多几层筛子来滤掉杂质，使重建的历史尽可能逼近真相。

《国家记忆》的编选与出版本意只是自说自话，把我们搜集到的史料经过初步拣选与编辑展示给大家，令研究者与历史关注者多一些原始资料。但在这些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手中资料与此前自己读过的一些专著论述矛盾之处。其中近年出版的两本与《国家记忆》有直接的关系，这两部书正好居于讲述中缅印战场历史两端的位置，一部是恢宏到顶，讲述者自称不仅亲历，而且是始终追随于战场最高指挥官左右，甚至在诸多重大战略布局中直接参与决策。这本书叫《军碑一九四二》，作者王楚英。另一部则是细致入微，作者以一个攻坚战役为记述对象，尽其所能搜集资料，力图动态、全景、客观、精准地把那场长达数月之久的血肉绞杀战还原出如临现场的生动状态。相对于第一本书，这一本所述之事小则小矣，然而一旦到位，则如同寻获了一只头、胸、腹、翅、足甚至触角也完整的灭绝昆虫，对它曾存活的大时代都有标本意义。这本就是余戈先生之《1944：松山战役笔记》。

我们都清楚，任何人都已无从回到哪怕是昨天的历史现场，就如同历史正在发生时无人能准确预见未来一样。重建历史只能够依靠来自于当事人的叙述与史料。古代史的细节求证所以困难，就因为时间久远，那时记录手段本就不多，少有的以文字传下来的信息根本无从覆盖漫长岁月与事件。而近到见证人哪怕稀疏，但仍还有在世的历史，求证也很难吗？难，尤其中国近现代史，这种曾被集体忘记的真相重建，因为缺乏参照物，一旦见证人记忆偏差、论述偏离事实甚至有意说谎的时候，界定“在场者”讲的是不是真话成了第一大课题。

《军碑一九四二》这部砖头一样厚重的被作者自称为“记忆的闸门从此打开”的皇皇巨卷，封面上作者王楚英先生在战场上的头衔先吓死你：“中缅印战区美

军司令史迪威上将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队长”。卷首作序的人物身份显赫：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中将、教授，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原会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显然，如果这部书确是史迪威将军在中缅印战场的烽火岁月中的贴身随员的口述史，那么，它对那段历史研究的价值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但可惜的是，这位自诩为当事人的作者在书中大部分的事件中其实根本不在现场，更遑论参与其中的决策与行动。这样的“口述史”，哪怕它流传的范围再小，只要有一本传下去，都有可能遗害。

我在二十多岁时偶然看到大约我五、六岁时的《人民日报》，那上面用记者之名写着粮食亩产的数字，任何一个都能把水稻专家袁隆平羞死。看到报纸的时候幸亏我已亲身种过几年水稻，那般照足了丰收下工夫的部队农场样板田，撑死了单季亩产800市斤，比照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几万斤仍然让人明知不可能而依旧困惑。为什么？因为假话之后的大饥荒虽已用上千万饿死的生命揭示了真相，但从来没有谁在那段岁月里直至今天负责任地宣布那些假的数字是假的。时间稍长，死掉的人被忘记了，但说假话的报纸因为各种原因留存了下来，并且很可能给知识不足的人造成错乱的概念。例如今天，稍微年长的人说到那段，仍习惯于用“三年自然灾害”这个事实上并不真实的特定句式一语带过。

这本《军碑一九四二》中作者的故事近几年屡被电视台、报刊甚至一些二战史研究者引用，以作为对某一历史事件与细节的证明。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这些引用露出了我们所谓专业媒体与学术界鉴别力低下的破绽。鉴别一部口述史是否“亲身经历和实事求是”（《军碑一九四二》序言对此书评价），其实并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只要对历史真诚一点，读到令人惊诧处别急着大喜过望，用多一些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就行了。说起来，这部书的特约编辑和写序言推荐此书的几位都是军人出身，对战争、战场、战斗技能与武器装备应该有最基本的了解，其中任一位对此书采用稍微专业并且负责任的态度来审读，这部伪得离谱的、漏洞比破渔网还多的书稿就根本不会一路春风地登上书店柜台。

我从书中拣出几段请读者过目并判断，这样的神话竟被当成历实的真实成书

了。作者在书中写到了一支由自己担任负责人亲自组建并在对日作战中三战三捷的奇怪队伍，据称叫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1941年12月16日，我随侯腾和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到仰光会见英军总司令胡敦中将，向他提交《中英联军缅甸南部会战计划》和组建中英联军统帅部与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等项实施方案。胡敦立即将其上报印度总司令韦维尔定夺。韦维尔随即电告胡敦：……（4）即请中国派人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参照‘温盖特突击队’的模式编组装备，由英军后勤部保证供应，……”

于是，就“从昆明军校5分校17期即将毕业的缅甸侨生中调30人，另从昆明侨务人员训练班侨生中抽调200人，当即用飞机运到仰光”。加上已在缅甸招募到的无家庭负担的华侨未婚男青年1200人中的220人，组建成了这支作者叫做“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的，总数为450人的相当于营级建制的队伍，并配备为一个30人的“特勤分队”和“140人的中队3个”，“由侯腾报经林蔚批准并征得胡敦同意后”，派作者担任指挥官，薛穆尔中校（书中载该员为英军情报部参谋）为总教官兼联络官。此外，还有中队长3人、副队长3人、分队长9人和3位组长。

按照最基本的军队任职规则，担任中队长、副队长和分队长的人都应不是“即将毕业的缅甸侨生”或“华侨未婚男青年”，而应是有经验的军人分别编入序列。故作者率领下的每一个中队应为145人。

书中称这支部队是“参照温盖特突击队的模式编组装备”。“每个中队配备：轻机枪9挺，冲锋枪36支，手枪6支，半自动步枪45支，背负式无线电话机6部，每人携手榴弹6枚，指北针1只，森林砍刀1把，弹药1个基数和其他敌后森林作战应有之装具以及英式服装背包。”

装备数字细至个位，连指北针每人1只都记载清楚，可见作者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遗忘什么。但是，问题来了。按照书中讲述的装备，这支145人的为特种突击作战而建立的武装队伍，连手枪在内，一共只有96支各式枪械，竟然有49人，也就是几乎三分之一的军人没有武器。我确实不理解这些没有武装的，没有打击力的，甚至没有自卫能力的军人们是在一支视火力密度为生命的突击队中吗？

这个明显的马脚告诉我们，所谓“参照温盖特突击队的模式编组装备”根本是作者的信口之辞，这种可笑的武器配备不符合“温盖特突击队模式”或者任何一种突击作战分队的模式，更何况当时根本就没有温盖特突击队这个模式，因为书中这个故事发生的1941年12月，温盖特本人正在英国养病，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下一步到哪儿混，哪里来的那支作为作者臆想模式的突击队呢。

按照书中所述，12月16日刚刚向驻缅英军司令递交组建报告，司令向印度总司令电报请示，总司令批复同意，连同远在昆明的230人从校中挑选抽调空运至缅甸仰光，并与已在缅甸的1200名招募人员中挑选出来的220人集结，进驻“仰光北部的燕子湖”那座英国军营，加上配发武器弹药，军服装具，直至12月20日中英两位将军来授旗阅兵，而且“军容严整、动作熟练、威武雄壮”，用了多长时间呢？三天。三天？三天！作者与编辑者都做过军人，你们相信这个据作者讲令英国人赞叹有加的“中国人创造的奇迹”吗？姑且抛开从头组建一支营级武装需要怎样的工作流程与时间表，这个三天，以官僚文牍著称的大英帝国将军们能让相关公文完成一趟正式旅行吗？

更令人惊叹的奇迹还在后面。作者在书中称自己领着那支483人的绝大多数是新兵的队伍和6位英国军官，当夜就出发，奉命至“一个叫麦沙老的小镇驻防”。随后，自1941年12月21日清晨至1942年元旦，作者的队伍总共完成了：1.实弹射击；2.夜间战斗射击；3.各种状况下手榴弹投掷；4.土工作业；5.伪装；6.爆破作业；7.扫雷；8.森林中行军；9.露营；10.河流通过；11.侦察；12.警戒；13.伏击；14.奇袭；15.单兵格斗；16.擒拿术；17.障碍超越；18.伤员救护；19.旗语；20.信鸽使用的训练科目。

真的太厉害了！作者的这支新兵队伍在十天里一共完成了20项单兵作战科目的训练，平均每个科目的训练时间只有半天，这个半天，摊在土工作业上连一个标准的单兵掩体都完不成。更别说土工作业中必须包括的战壕与工事构筑。在我当兵的年代，仅射击一项，从第一练习（卧姿100米胸环靶）至第三练习（立姿100米、跪姿150米胸环靶，卧姿200米胸环靶）训练，就总共用了超过四十五个

训练日。也就是说单是卧姿对 100 米固定目标的射击训练，就进行了十五天。而这三个射击科目全训练完结，还不包括对移动目标的射击训练和夜间射击的单独训练科目。作者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青年都是刚刚从军，请问谁有如此奇异的功能和方法用半天时间来训练他们单兵格斗，并用这半天的训练让这支菜鸟队伍拥有了勇气与技能，去战场上面对以白刃战见长而且实战经验丰富的日本步兵呢？1942 年初，中国军队在缅甸的对手是以日本北九州的矿工为主体组成的师团，以作者书中这支要经验没经验，要体力没体力，要技能没技能队伍真能神话般地“三战三捷”吗？日本军队真是太不经打了，没摸过枪的一群孩子训练十天的队伍都能轻取三连胜，还需要我们三百万军人的牺牲和八年浴血抗战吗？

而且，虽然作者罗列了如此多的训练项目，我却看不到任何小组、分队的战术训练，完全没有进行演习。做过军人的作者和编辑者应该清楚，军队之所以有战斗力，不仅是因为单个士兵有战斗技能，更重要的是团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很显然，作者没有顾及这一点，不是记忆上的遗漏，而是故事编得不圆，因为作者根本就没干过自己吹牛的这件事。

这其后，作者自述他亲率这群只训练了十天的青年百姓上阵了。书中说“胡敦（书载其为英军总司令）命令我这支仅训练两周的‘半军半民’式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来替英军打头阵”。说实话，这个历史玩笑真开大了。在国家主权中，还有什么比军队的指挥权更重要呢？中英两国什么时候签订过协议，英国军官可以直接调动指挥中国军队，哪怕一支小部队，哪怕“半军半民”呢？何况居然还是“替英国军队打头阵”。作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编辑者眉头不皱就放过去了，这后面有多大的历史责任，各位掂量过吗？

书中“三战三捷”的梦呓我不浪费读者时间了，反正书里面作者自述亲历的每一场胜仗都是伏击；都是敌人毫无觉察，百分之百按照作者预设走进伏击地点；都是使用预埋的地雷与集束手榴弹；都是敌人非死即伤、仓皇逃窜；都是打死敌人有名有姓的几个；都是连打伤逃跑了的敌人作者也清楚地说出他们的姓名和职务。后面还有作者王楚英先生率队救出英军装甲部队，并在中国远征军大溃退时

勇陈利害，说服斗志全失的第66军军长张轸指挥第五军装甲兵团某营奇迹般打了胜仗的怪诞情节：“5月2日，日军攻占贵街。……张轸在阵地上听说敌战车群正沿公路向这里冲来，情急之下，遂令第五军装甲兵团营长鲍薰南将该营12辆战车横塞道路，以图阻敌。我正在张轸身旁，听他此言一出，不禁诧异难制，便冒冒失失地对张军长和鲍营长……斗胆建议：请将我军这12辆战车梯次埋伏在路旁密林中，乘敌不备，用我战车上的火炮摧毁敌战车，同时由工兵在路上埋置炸药爆破敌车。……我令宪兵排除留1个班护卫林蔚、张轸外，其余都埋伏路边，保护战车。……战后统计共计毁敌战车6辆、装甲车3辆、汽车13辆，打死打伤敌兵数百人，创造了中国远征军全线溃退中惟一的一次大胜仗。”（《军碑一九四二》第171页）

任何一位稍具军事常识的朋友都应能看出来，这段有关1941年底至1942年初作者王楚英先生缅甸故事的致命缺陷了。关于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除了王先生的口述，我至今尚未看到任何其他人的回忆与文字史料。而王先生真实任职过“史迪威上将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吗？

《军碑一九四二》中作者精准到几乎每一天地讲述自己在史迪威将军身边工作和战斗的“真实”经历。其中1942年4月16日开始的那几天令我印象深刻，按照书中115页开始的“回忆”，我为作者列了一个行程表：“16日早5时出发”，“3辆摩托车”、“一辆指挥车”、“3辆小吉普”、“3辆中吉普”，“共7辆汽车”，于“16日上午10时许，史迪威、罗卓英一行”，“长驱300多公里，来到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爆炸声的乐可”。

5个小时，这样的一支车队，在缅甸稀乎烂糟的崎岖山路上，居然能齐齐地开行300公里！作者天然地以为，每小时60公里时速是很简单的一次汽车旅程。但是，错了。如果真要达到连续5小时在砂石山路上平均时速60公里，车速在相当比例的行驶时段要达到甚至超过90公里时速才行。另外，这支车队所有人员中途都不能停车进食或大小便。

假若作者当年真的驾驶过，或者乘坐过书中被称为“小吉普”的那种军用汽

车，就应该会记得，战场上的那种车没有固定的车顶，也没有车门，为了作战方便当然也没有安全带。另外，那种车的座椅又矮、又窄、又平、又硬，车底是钢板减震，车速稍快，遇上个沟坎，人会从座椅上跳起来。4月中旬，缅甸的雨季还未来临，驾驶这样的车在山间土路千折百转，车轮卷起的尘土比烟雾弹还浓，后车根本看不见路，还加上三辆摩托，5小时狂奔300公里！如果这是真的，将军还能留在车上不被甩出去吗？为了不让将军飞下山谷，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弯道时把车速降下来，可是1942年的吉普车并没有强大的马力在弯道过后的上坡轰然而起，它的优势本就是低挡位、低速度的高通过性。十多年来，我无数次驾驶比那种吉普马力大三倍以上的越野车穿行于当年的滇西战场，也曾驾车驰骋于干季的缅甸山路，从没有一次，也想都不敢想以5小时的时间飞驶300公里这样的天方夜谭式的奇迹。

历史学家黄仁宇1943年起在驻印军任尉级军官，他叙述3月下旬的缅北之路，“我们午前十一时由六十六团指挥所出发，一路行经山腹，路幅宽窄无定，路面又未铺砂石，车行非常不便。沙杜渣以北，辎重部队的驮马不绝于途，车行速率不能超过五码。”时速不到5英里，也就是9公里，当然他讲述的不是同时、同地段、同条件，但都是缅甸的旱季。他们一台车时速不足9公里，作者的车队如何在5小时车途中持续近七倍于此的行驶时速呢？

故事更厉害的还是这个行程的下半段。那天，作者在陪伴史迪威将军亲临火线，亲眼“看到在山脚下、田野里、村落中我军阵地前……成群的日本步兵，手持武器，身披伪装，既似人更像兽，成散兵队形，跟随在日军10多辆装甲车、坦克后面，……向我军阵地涌来。”并被我军打得“死伤无数”后，在下午4点钟结束视察，居然同样也只用了5个小时，把这300公里路又开回去了。想清楚呵，如果是在白天，尘土飞扬的路上还只是单纯的视线障碍，在夜间山路上，车灯照射下，这根本照不透的浓密尘土直接就是高速车队的夺命杀手了。

作者隐隐约约地告诉读者，他亲身追随史迪威将军徒步撤出缅甸。“他（史迪威）指定罗伯茨中校率领被点名乘机的人，马上乘汽车去登机。等他们出发后，